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四个伟大”的多维思考

王自贵

(重庆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学院,重庆 400052)

摘 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顺应时代发展之需,把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四个伟大”思想^[1]。“四个伟大”是新时代的理论精华,它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它蕴藏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同时,它还具有鲜明的理论品质,体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科学性与前瞻性、纲领性与时代性、实践性与人民性、战略思维与问题导向的统一。“四个伟大”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完成新时代所肩负历史使命的基本遵循,它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具有不可或缺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四个伟大;历史渊源;哲学意蕴;理论品质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中特理论项目“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百年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2021ZTZD12);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想道德教育有效性的研究”(2018-GX-165)。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8-0078-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8.006

人类文明史揭示: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跨越和进步,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指引。每个思想大发展时期都是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百年未有之变局,这是一个社会变革日新月异的时代,也是一个追求理论创新、崇尚实践出真知的年代。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把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分别写入党章和宪法,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四个伟大”是贯穿这一思想的重要理论趣旨和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讲话或报告中提及,常提常新。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四个伟大”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成果。据检索,突出“四个伟大”主题的期刊论文 330 多篇,硕士论文 4 篇,报纸文章 100 多篇,专著 3 本。具有代表性的成

作者简介:王自贵,重庆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果是韩庆祥、张艳涛合著的《论“四个伟大”》。尽管“四个伟大”有关研究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但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通过考察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渊源、透视其深刻的哲学意蕴、揭示其理论品质特征的论述尚付阙如,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丰富研究成果。

一、“四个伟大”的历史渊源

“四个伟大”中,每一个“伟大”都有历史渊源,都富有深刻的理论意蕴和实践价值。以下从历史渊源和文本释义的角度,分别探讨“四个伟大”。

(一)伟大斗争

毛泽东思想包含丰富的关于斗争或伟大斗争的观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撰写了《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这些文章论述了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发扬斗争精神、开展形式多样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撰文号召“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诞生以来,在 24 年历史中,经历三次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2]这是笔者能够查到的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伟大斗争”。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再次提出: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向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3],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著作仍然闪耀着斗争思想的光芒。如《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7 年 3 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4]⁴⁰³毛泽东同志在 1962 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讲话、报告中鲜有论及“斗争”。江泽民同志于 1993 年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讲话。遍览《胡锦涛文选》^[5]难以找到关于“斗争”的论述。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一句话,我主持起草工作时就主张写上去,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句含义是很深的。”^[6]显然,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是经过深入思考有感而发的。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人民顽强前行的伟大斗争中。在 2017 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包括伟大斗争在内的“四个伟大”作为一个整体论述,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伟大斗争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 2019 年秋季学期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的重要讲话中通篇用了 58 次“伟大斗争”“重大斗争”等包含斗争的词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只要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就能够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挑战。

伟大斗争实至名归。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踔厉奋发、不畏牺牲,与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了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缔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从斗争目的、斗争形式或者斗争成就看,这些斗争无疑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比,尽管斗争对象、斗争形式、斗争内容、斗争目的、斗争环境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仍因探索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使斗争更显伟大。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与贫穷落后的伟大斗争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翻天覆地的兴国富民大业。实践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继续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形式多样的伟大斗争,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挑战,完成民族复兴的强国大业。

(二)伟大工程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一直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工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及其建党思想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逐步确立。毛泽东同志早在 1939 年 10 月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把党的建设比喻为一个“伟大的工程”。他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7]1975 年 7 月,时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就对党的建设高度重视,他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集训会上强调:“当下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中央批评他们也是为了帮助。要维护省委的领导,帮助省委建立威信,使省委对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各项工作都能领导起来。”^[8]1987 年 1 月,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需要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这几年来,一直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注意这个问题,可在实际工作中党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9]1989 年,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正是基于对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视,才使我们党和国家经受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巨大冲击,及时平息了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擘画如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回顾党的建设不同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把党的建设称为一个“伟大的工程”,因而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命题。从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起,江泽民、胡锦涛、

习近平三任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和报告中,都强调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建设因宏伟艰巨而彰显工程之伟大。建党 10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彪炳史册。1927 年国民党背叛国共合作致使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选出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及时指明了斗争方向。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短短 3 个月时间从出发的 8.6 万人锐减到 3 万余人,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及时召开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又一次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百年党史一再证明,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这项工程之伟大主要在于:一是因主体庞大而伟大,九千多万党员所组成的党堪称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政党;二是因内涵深刻、外延丰富而伟大,党的建设工作浩繁复杂,无论深度广度其他政党都无与伦比;三是因目标宏伟而伟大,党的建设道阻且长,任重道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非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四是因党具有不断自我革命的勇气和能力而伟大。

(三)伟大事业

毛泽东同志的著述里多次提到过伟大事业。毛泽东同志在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开幕词中强调: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4]133}。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四部门举办的党建理论研修班讲话时指出:“党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就一定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我们的国家,为中华民族,为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0]这次讲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伟大事业有机结合在一起。此后,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的多次重要讲话和报告中,常常把“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放在一起论述,强调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论述“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的思想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踏平坎坷成大道,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自信,但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事业艰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前车之鉴历历在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昭昭在目。直面国内外的复杂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世人瞩目成就尤为伟大: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推动了理论创新;其次,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发挥,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亘古未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巨大成功的显著标志;最后,因创新而伟大,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始终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展开。

(四)伟大梦想

一般说来,梦想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空想或妄想;另一是指急切地盼望。显然,伟大梦想中的梦想比较接近后一种用法,但更有深意,这里梦想除梦寐以求外,还有理想的意蕴。梦想用作名词时

指不合实际的空想、妄想,而理想则是往往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在其后党的一些重要文献以及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的多次重要讲话和报告中,一直延续这一用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11]。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几代中国人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从语形上看,这次讲话提到的“中国梦”可以算作习近平总书记“伟大梦想”的源头;从语义上分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后来演变为“伟大梦想”的特殊内涵。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2]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又进行了高度概括,明确提出“伟大梦想”概念。

伟大梦想揭示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是不同阶段党和人民矢志不移、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治国理政的追求目标,为此党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之“伟大”主要在于三点。首先,梦想因本身壮丽恢宏而伟大。古代中国曾经因辉煌无比而令世界瞩目,鸦片战争以来一度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伟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但壮志未酬身先死。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为己任,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今日之中国比近代以来任何时期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其次,梦想因全面深刻而伟大。伟大梦想集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和公民个人情怀于一体。伟大梦想在国家层面体现为,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民族层面体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公民个人层面体现为,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最后,因责任重大而伟大。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时强调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时成为特区最响亮的口号。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时,再一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兴邦要求每一位党员和公民肩上都担起民族复兴的使命和责任,各党派各团体都要凝心聚力谋发展、务实笃行为圆梦。

二、“四个伟大”的哲学意蕴

重视哲学思想、善用哲学方法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两次召开专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还发表了《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身体力行学哲学,更注重将哲学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四个伟大”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智慧、哲学观念和哲学思维,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透视着

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彰显着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一)辩证唯物论底蕴

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四个伟大”思想立足党的十八大以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实践,顺应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对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课题作出相应回答。“四个伟大”思想属于意识形态里的上层建筑,受制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同时,也应看到,“四个伟大”正确思想一经形成,就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反作用于工作实际。这充分体现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和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充分体现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论观点。

矛盾论和矛盾分析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世界充满矛盾,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并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社会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有矛盾就必然会有解决矛盾的斗争,矛盾越复杂意味着斗争越艰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然要解决各种矛盾,解决矛盾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生产落后的状况已发生根本改变,甚至在一些方面已出现结构性问题。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断。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论断是矛盾分析法所得出的正确结果。伟大工程是主要矛盾,它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起着支配地位和决定作用。在伟大工程建设中,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体现出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在分析矛盾时,抓伟大工程和政治建设,体现了“重点论”;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三个“伟大”和“五个建设”,这是“两点论”;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达到两点和重点的辩证统一。

量变质变规律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方式和状态。实现伟大梦想是质变,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和推进伟大事业方面,现在每前进一步所做的工作都体现为量的积累,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超过临界点时,伟大梦想的质变就会如期而至。为了促进量变向好的方面转化、阻止量变向坏的方面发展,必须开展许多有新特点的伟大斗争,以此促进量变加速成就好的质变,遏制量变向坏的方向发展,防患于未然。我们对美好梦想充满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同时也应看到,当量的积累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没有超过临界点时,质变就不会发生。易言之,只有通过具有新特点的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困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不断推进伟大事业,才能最终实现伟大梦想。无论是建设伟大工程还是推进伟大事业,我们都应该保持清醒头脑,增强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敢于直面复杂多变的斗争局面,勇于和善于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斗争,在斗争中把握规律,锻炼才干,增长智慧,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这句话揭示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同志认为,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14]。梦想照进现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具有现实可能性。现实可能性也仅仅是一种发展趋势,还不是现实,既要防范大概率的灰犀牛事件、又要防止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谨防坏的可能性发生。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伟大梦想的实现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也会体现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宣传,不断增强理论自信;另一方面,我们要勇于直面各种困难挑战,善于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

(二)历史唯物论底蕴

联结过去和现在而昭示未来的是历史意义链条,历史赋予人们所需意义的精神源泉。“四个伟大”中的每个伟大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含义也不尽相同。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第一次使用“伟大斗争”时,只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具有敌我对抗性质、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使用的“伟大斗争”在含义上明显不同。如此,今天我们领会“伟大斗争”思想时,既要历史地考察“伟大斗争”的发展过程,更要逻辑地给出确切含义,弄通来龙去脉,精准地把握内涵、外延的变化,揭示发展变化规律。同理,在理解其他三个“伟大”时,也要做到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在考察“四个伟大”时,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弄清每个“伟大”的发展脉络及其相互关系联系,使其呈现一个相互连接的统一整体。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历史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改造和制作,从而上升为理性具体,成为科学的理论。

充分重视意识的能动反作用。“四个伟大”属于社会意识层面的上层建筑,既包含政治上层建筑也包括观念上层建筑。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先进的上层建筑对作为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具有巩固和促进作用,“四个伟大”是经过初步证明了的先进的观念上层建筑,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巩固促进作用。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对其他因素起着决定和支配作用。“四个伟大”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其核心部分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国家政权的核心,堪称核心的核心。这就是“四个伟大”中把伟大工程作为起决定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据。为充分发挥“四个伟大”的能动作用,首先要坚定不移建设好伟大工程,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财富和一切精神财富,也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变革发展的决定力量。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无不证明了这一唯物史观的正确性。人类的选择顺应其客观规律就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否则就可能阻碍或迟滞社会的进步。“四个伟大”思想是党在长期奋斗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

(三) 人民至上的价值论底蕴

在党的十八大当选政治局常委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地宣誓: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年弹指一挥间,总书记夙夜在公、勤勉治国理政,忠实地践行着这一承诺。伟大梦想体现 14 亿多国人价值取向的最大公约数,昭示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价值主题,是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途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务必把伟大事业建设好、发展好。透视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的逻辑关系,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重要判断表征出的是我们党建设伟大工程、领导伟大事业的道德引领和价值规范,由此决定通过伟大斗争不断增强前进的活力和动力,在砥砺前行中坚定信心。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诉求。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的共同价值。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句话绝不是简单的意义重复,前者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是精神层面的道德情怀体现;后者是客观的存在现象,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与江山辩证关系的正确把握。只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能有效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共产党人自身价值的体现,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四个伟大”新话语、新表述凝聚出的历史意义链条,催生出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定格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

“四个伟大”话语体系所投射的道德情操和价值追求,契合了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人民群众是贯穿“四个伟大”的中心线索,是理解其深刻内涵的“金钥匙”。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建设伟大工程要站稳人民立场,向人民负责;开展伟大斗争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进伟大事业要造福人民,满足人民的多元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此外党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党执政要以民为本,对人民负责,关心人民疾苦,始终做到利为民所谋,保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们,不断结合历史、时代与实践的变化,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15]。“四个伟大”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精神瑰宝,它蕴含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其内容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伟大斗争契合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伟大工程契合了唯物辩证法的意识主观能动性原理;伟大事业契合了唯物辩证法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理;伟大梦想契合了历史唯物论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四个伟大”之间的关系契合了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等原理,贯穿其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彰显了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四个伟大”是对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之问的响亮回答,它明确昭示世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发展动力、发展道路和阶段性目标。

三、“四个伟大”的理论品质

“四个伟大”具有鲜明的理论品质,主要体现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科学性与前瞻性相统一、纲领性与时代性相统一、实践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战略思维与问题导向相统一。

毛泽东同志在 1945、1957、1962 年多次提到过“伟大斗争”,江泽民同志在一个批示中也提到过“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点提出“伟大斗争”,并增添了新依据、新内容。毛泽东同志早在 1939 年就把党的建设比喻为一个“伟大的工程”。从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起,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和报告中,都强调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毛泽东同志称社会主义为伟大事业,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总书记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伟大事业。孙中山先生早在 1894 年“兴中会”组织《章程》中明确提出“振兴中华”。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命题,在其后党的一些重要文献以及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的多次重要讲话和报告中,一直延续这一用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伟大梦想”概念,同时对“四个伟大”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明确释义。上述无不体现“四个伟大”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科学性是指思想符合客观实际,能够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也指概念、定义、论点正确,论据充分,论证严谨,结论可靠等。“四个伟大”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映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因而是科学的。前瞻性是指往前看的特性,与预见性的意思相近。就是要有长远的眼光,充分预见还未发生而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尽早作出各种安排和应对之策。“四个伟大”作为科学性的指导理论,不仅着眼解决当前的问题,更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党制定政策和行动纲领的基本遵循,能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世界观的引领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前瞻性的集中体现。综上,“四个伟大”体现科学性与前瞻性相统一。

纲领性一般指文件等简明扼要,具有统摄作用、指导作用。如政党、政府规定在一定时期内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步骤等。“四个伟大”提纲挈领地擘画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斗争”只对重大、重要斗争进行纲领性规定,强调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至于斗争对象、斗争方法、斗争措施等具体问题没有涉及。“伟大工程”也只是从宏观上强调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紧迫性、必要性、重要性等,关于党的建设具体内容、具体方法、具体措施等并未提及。“伟大事业”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必要性、重要性等进行论述,没有关于推进伟大事业的具体措施、具体步骤、具体途径、方式方法等内容。伟大梦想只扼要概括内容和实现起来的艰巨复杂性。时代性这里是指从时代之间中找到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运用颇具时代特点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形成彰显时代特色的理论。黑格尔指出,任何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6]。“四个伟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直面新时代的新变局、新矛盾、新问题、新情势,回应以新举措、新战略、新观点、新思想。因而,“四个伟大”彰显纲领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人类自觉意识指导下的活动,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实践性指正确理论的形成除了符合思维规律外,还应在各种实践活动中接受检验,被

实践证明了的才是真理。“四个伟大”源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实践性是其显著特质。人民性在指导思想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价值取向上彰显“人民至上”,在行为准则上体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造福人民”。人民是开展具有许多新特点伟大斗争的实践主体;人民是实现伟大事业的依靠力量和目的归宿;人民也是新的伟大工程的动力之源;人民的福祉是伟大梦想的重要内涵。抓住“人民”二字,就抓住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四个伟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人民性”显而易见。概言之,实践性和人民性是“四个伟大”最鲜明的品格。

战略思维是一种立足长远、掌控宏观、总揽全局、顺应趋势、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和方向的思维方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揭示党和人民中长期奋斗目标,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是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的航标和灯塔;伟大斗争是推进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的不竭动力之源;伟大工程为伟大事业、伟大斗争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问题导向是一种基于发现和解决问题为宗旨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问题导向要求以问题为抓手,着力发现隐性问题、消除隐患,不遗余力解决各种问题以推动工作。伟大梦想昭示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问题,伟大斗争蕴含奋勇向前的动力问题,伟大事业锚定前进航路永远正确问题,伟大工程提供一切有效组织保障问题。显然,“四个伟大”是战略思维与问题导向的有机统一。

四、结语

实践铿锵有力,思想光耀千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正确的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的探索不能停止,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思想建设规律的把握,开创党的思想建设新境界^[17]。新时代催生新的理论,“四个伟大”应时代之需而生。“四个伟大”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新时代历史关键节点的理论创新,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又一理论成果。“四个伟大”内涵丰富而深刻,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光芒,具有鲜明的理论品质和重大的时代价值。“四个伟大”不是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僵化理论,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同志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8]这一观点揭示了人类认识不断深化的客观规律,揭示了人类认识是一个日新月异、永无止境的过程。深入理解这一理论务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全面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参考文献

- [1] 韩庆祥,张艳涛.论“四个伟大”[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2.
-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994.
-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1420.

-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03,133.
- [5] 胡锦涛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6]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82.
-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565.
-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
-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6.
- [10]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4.
- [11]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29.
- [12]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3-24(002).
- [13]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
- [14]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中共党史研究,2016(10):5-11.
- [15]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3.
- [16]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杨,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
- [17] 吴宗伟.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百年探索的基本经验[J].重庆社会科学,2021(4):29-40.
- [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273.

Multi-dimensional Thinking on Four Greatne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Wang Zigui

(Department of Open Education, Chongqing Open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52)

Abstract: Based on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n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integrated the great struggle, the great project, the great cause and the great dream, and therefore the Theory of Four Greatnesses has come into being, in which exists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of the new era with rich Marxist philosophy background. The Theory has a distinct theoretical quality which reflects a unity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 unity of the scientific and the foresighted, a unity of the programmatic and the epochal, a unity of practice and affinity to the people, a unity of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roblem orientation. The Theory also responds to the concerns of the times which h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and irreplaceable value for national prosperity,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people's happines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four great; historical origins;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theoretical qualities

(责任编辑:易晓艳)